

# 小序

李树

中南大学出版社原名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是一家办得很有特色的大学出版社。它的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田荣璋教授，在位十余年，引导了它，哺育了它，亲历了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的全过程。现在，他要把记录这个全过程的日记，择编出版。这样的日记，对以后人们研究现代中国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历史，当然是一份有用的资料。田荣璋教授要我为这本择编出版的日记，写篇小序，我“恭敬不如从命”，答应了。

在我翻阅这本日记清样的过程中（坦白地承认，我只看了一部分清样，未全看），猛然记起，八年前，为纪念这家出版社成立十周年，我也曾应约写过一篇文章，名曰《越俎代庖的总结》，从侧面记述了这家出版社成长的主要经验。但其中写了些什么，自己也记不起来了。此文我未留底稿，在中南工业大学校报上发表后，也忘了留一份报纸。只好又托田荣璋教授去找此文。重看之后，觉得现在要讲的话，八年前大体上都已讲过，如今，当不宜在小序中，重复老话。于是，决定把此篇拙文，作为小序的附件，重新发表，过去讲过的，序中就不再重复。

需补充的几句话是：大学出版社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是要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促进学术的自由研究和自由讨论。没有充分自由的研究的讨论，学术上独立思考出的观点和创见，就无从

表达，这样，就会使学术思想停滞，僵化，乃至窒息，结果也就必然阻碍了学术的发展。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科学领域，都是如此。党制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政策和我我国宪法上的有关规定，都在保障着这种发展学术所必须的自由研究和讨论，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目前，我们实际上还不能把这件大事完全付诸实施。八年前，囿于环境，拙文中也没有去表达这一重要观点。但现在，如果还去回避这样重要的观点，那我就于心有愧了。田教授的日记中，有一件事，是记述了他们出版社有意地在保护学术的自由讨论，虽然记得简略，但却颇为可贵。说的是：他们出版了一本阐述“人性论”的著作（其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把人和人道主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可以想象，这本著作是冲破了“左”的桎梏、抵抗了“左”的棍子以后，提出的一种学术上独立的见解）。而这本著作出版后，有人又要出书批判这种见解（又可以想象，这种批判无非是类似于“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那种与学术无关的“大批判”），但被他们拒绝了。这也就保护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可惜，日记中这样的例子不多。也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可能出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有一个这样的实例，也就足够了。

我认为，大学出版社这一重要职能，对促进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先进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强调。至于在实际工作中，是否能够这样做，操作起来有无实际困难，那又当另作别论，此处从略。

是为小序。

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

附录：

## 越俎代庖的总结

——纪念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成立十周年

李冰封

时间过得真快。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十年前,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当时叫中南矿冶学院出版社)和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在湖南省委接待处礼堂联合举行成立大会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那天,我代表湖南省出版局向三家新成立的出版社表示祝贺,并提了三点建议。那三点建议是:(一)希望新成立的大学出版社能反映出本大学现有的学术水平,并促使本大学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每个大学出版社都要有自己的学术特色。(二)出书要把好质量关,“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三)一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力求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当然,这只是要点,其中还谈了一些具体意见。这篇演说词,以后收在1980年10月出版的我的一本散文随笔集里,题目叫做《大学出版社要有自己的特色》。

这三点建议,其实是非常一般化的建议。但在去年,听田荣璋教授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建议基本可行。

早几年,当我还在工作岗位上时,好几次去过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平常,和田荣璋教授接触也不少,因为那时,我们都是出版编辑系列的高评委,开会评职称时,经常住在一起,过从也多。且平时还可看到他们全部的样书。那时候,据我了解,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的确办得不错,有自己的特色。别的不说,光是能出版陈国达教授的《陈国达地洼学说文选》(英文版)和赵天从教授的《冶金》(英文版),那就很了不起。虽然我看不懂这两本专业的书,但

我知道它们在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分量和影响,知道它们的社会效益。此外,全社的经济效益不错,也就能调动全社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这些都是前几年的印象。当然也只是印象而已,认识难免肤浅。

1983年下半年,我离开工作岗位后,对他们的情况就不大了解了,但从侧面听说,他们的工作还是弄得不错。

几个月前,田荣璋教授要我写一点文字,纪念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成立十周年,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他给我寄来了一本他们自己弄的,名为《出版探索》的文集,以提供些资料,供写文时参考。当时,我正全力准备一篇论文,因为不久要去北京参加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那集子因而就不及细看。上月从北京回来后,又因琐事缠绕,还是顾不得看。早几天,要写这篇文章了,才翻阅了那集子的主要部分,看后,颇受启发。我的体会是,这十年,他们和他们的主办单位,的确做了许多工作,“十年辛苦不寻常”,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

依我看,这经验主要可归纳为四点:

(一)他们的主办单位中南工业大学,能真正按出版工作的规律来对待大学出版社,把大学出版社作为他们学术整体结构中提高教学水平、提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让他们按自身的工作性质,在自身的工作范围中发挥作用,让他们出书,出人才、出学术,表现科研成果,而不把他们作为一个创收单位,不要求他们上交利润。一句话:不向他们要钱,但一定要求他们出好书。这就做对了。现在大学的办学经费普遍不足,要办好大学当然需要钱,当然要想办法创收。但创收可以想别的许多门路,不靠出版社。一个大学出版社,每年能上交好多利润呢?充其量上交百把万吧,如果为了这一点钱,逼着他们去出些不三不四的书,使出版社不能在“正道”上发挥作用,影响他们出好书,出人才,出学术,从而降低了整个大学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也从而损坏了整个大学在国内外的声誉和形象,对比一下,哪一种损失

大些呢？有水平、有远见的领导，当然选择前者，而不会选择后者。他们的主办单位有这些远见，是他们搞好工作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他们的主办单位，在出版社工作人员的挑选和流动方面，能充分支持他们。这一点也很重要。一个单位，如果在人员的组合方面，是一潭死水，能做事的人不能进来，不能做事的人不能流动出去，有些人又“占着茅坑不屙屎”，单位上冗员充斥，有些闲着没事做的人，难免无事找事，无事生非，那么，这个单位的领导，即使有三头六臂，无论如何也弄不好整个工作的。况且出版工作是个专业，从事这个专业的人员，需要有这个专业性质所要求的各种素质，而人的秉性各异，有的人适于教书，适于搞科研，但却不适于搞出版；有些人能搞出版，但却不适于搞其他工作。这是由每个人个性的各方面特点决定的。本来，要使每个人都能发挥他的长处，都能在他们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发挥最大的作用，是一门领导艺术，但领导能正确地这样去做，需要一种体制来监督、来保证，这种体制要能监督和保证人才的合理流动，而不成为一潭死水。中南工业大学的领导，有鉴于此，在这一点上支持他们，这是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能搞好工作的另一重要保证。

以上两点属于外部条件。以下要提出的两点，属于内部条件：

(三)出版社内部不搞什么“编辑个人经济承包”。“编辑个人经济承包”，是指出版社每年分给每个编辑若干书号，编辑个人按规定给出版社交好多利润，其余归他自己所得。这是一种违反出版工作规律的、也是违反精神产品生产规律的、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倒退。因为，一个社会其所以需要出版这个行业，需要某一个出版社，主要不在于要它为社会创造了好多利润，而在于要使这个行业在社会中去积累文化、启迪民智、倡导科学、建设文明。除此之外，出版要走向现代化，需要各种物质和精神条件。个人经济承包，在若干年内，也不能有助于创造这些条件。个人经济承包，还使编辑只着眼于为个人弄钱，只着眼于弄能获利的低质量的“大路货”，而不可能去出高质量的书，因为上交利润才是硬指标，其

他都是软指标。且在当前,一般说来,出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第一版都不能赚钱。这就使承包的编辑,更不可能去考虑出这类著作。现在有些大学出版社,出些与大学的名声很不相称的测风水的书、看相算命的书、低级庸俗的色情小说、荒诞无稽的宣传封建迷信的书,大大败坏了堂堂大国的最高学府的声誉,且贻害学生,误人子弟,其所以出这些书,除出版社有关人员素质很差以外,其重要原因之一,盖出自“编辑个人经济承包”。1985年第四期《出版科学》杂志,曾刊载拙文《论编辑个人承包制不可推广》,曾详细论及此事,此处不赘。应该说,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不搞什么“编辑个人经济承包”,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之一。这个活生生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所谓“编辑个人经济承包”,不但不能促使出版繁荣,而且违反出版业的生产规律;凡违反规律的事物,都不可能是正常的事物。

(四)在出版社内部,领导能放手大胆、充分地调动内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的积极性能用在工作上,把工作做好。这一点,是每一个能做好工作的单位,都必须具备的条件,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也不例外。

以上的归纳,如果能够成立,那么,这四点经验,加上十年前我提的三点建议,共七点,就构成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能获得今天这样成就的基本框架。希望这个框架还能不断补充、完善,在未来的十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祝他们不断成功。

我已离职数年,不谙当前的实际情况,且越俎代庖,冒昧作文,陈述如上意见,以求教于方家。

1985年 10月

# 前摇摇头言

出版个人日记，我是没有资格的。因为，成绩不多，贡献不大，名望不高，地位不显。

由于平时喜欢写写记记，天长日久，有所积累，回忆往事，不费精神。

出版社更换领导，新人想了解旧事；上级要材料，我是常被想到的人。脑子记不了那么多东西，靠翻日记，引起社领导的注意，提议把我个人的日记出版，对出版社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建设。

从1959年中南矿冶学院酝酿、申请成立出版社时起，到1979年我退休时止，十几年的光景，有四千多天，个人日记里什么都有，只好出择编。择，即选择，挑选；编，即把分散的事物按照一定的条理组织起来，或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或按照需要给予取舍和整理。如此一来，篇幅也就不太大了。

事情决定后，我就从头开始，先抄录与出版有关或相近的内容，然后再进行择编，多次易稿，时间已过去两年。文援朝教授任社长后，催我奋进，近日才把不像样的《大学出版岁月——日记择编》交到社长手中。

在出版日记择编的过程中，得到了黄伯云校长和邱冠周副校长的关注以及省新闻出版局原副局长刘孝纯同志的推动，湖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出版局原党组书记兼局长李冰封同志为《日记》作序，承蒙黄尚安、文援朝先后两位社长的鼓励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日记是当时当地依据原始事物写的，今天回头看，可能有些不尽人愿之处或有褒有贬言词，望有关同志给予谅解，不胜感激。

田摇摇头璋

1998年 缘月于中南大学





没有。学校已经给有色总公司写了报告（〔1958〕矿教字第 407 号文），申请成立出版社。此事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在“文化大革命”中，冶金工业出版社陈彰勇同志提议让我编书，我参加编写了三本书，受过机械工业出版社严格训练，培养出一些感情。我答应这件事由我来办。

### 远月 愿日

今日到水利水电出版社找王维勇社长，他把办出版社的程序仔细地告诉了我，并且还说他到文化部出版局帮我问问情况。王社长是中国出版界有影响的人，成了我进入出版界的老师。

### 远月 猿日

远月 圆日到学校办公楼上班，还有点不习惯。

教务处分工我主管教学研究、教学改革和电化教育。另外还有筹办建立出版社这件事。

### 愿月 员日

得到信息，有色总公司已给文化部打了报告（〔1958〕中色教字第 298 号），申请成立中南矿冶学院出版社。

据说，文化部要求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教育厅会签。

我处组织撰写给湖南省委宣传部申请成立中南矿冶学院出版社的报告（〔1958〕矿教字第 407 号）。

### 愿月 员日

愿月 员日陪同刘立书记到北京办事。

今天到有色总公司。他们说已去过文化部。关于成立出版社之事，文化部的答复是，中央有文件，暂停成立新的出版社，对已成立的出版社进行整顿。但是，考虑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







宋魁元和田荣璋，再多找几个人，研究一个方案，出版社应该怎么办。现在的印刷厂和三刊一报也搞个规划。言外之意是想把这几个单位联合起来。我看此举不会比申报成立出版社容易……

## 猿月 圆日

院办召开关于成立出版社的座谈会，出席人员有：刘立、王鸿贵、汪早姣、廖才英、马志忠、皮光中、田荣璋等人。

王鸿贵副院长首先发言。他说可以办成大组织，三刊一报与出版社在一起；也可以办小组织，各刊、报和出版社都是学校的业务单位，各自独立，互相帮助。让大家讨论。

院长助理汪早姣认为，出版社为一个单位，她应包括行政、编辑部、出版发行科和印刷厂。

院长助理廖才英说，应根据自己条件来组织。我院有大量的教材和文章要出版，编辑力量差，印刷厂承办能力小，不要搞大机构。各单位先不在一起可能还好些。我主张出版社先搭架子，重点出版教材和专著。设想大些，步子小些，决定因素是编辑力量。

刘立书记提出，应先成立机构。出版社应办成实体。出版社和印刷厂是隶属关系，出版社领导印刷厂，不是合同关系。至于其他几家先不搞在一起。

院长助理廖才英提议，应强调经营型人才为社长。

皮光中（学报负责人）认为，出版社抓得好就盈利，抓不好就赔钱。赔钱的队伍就不好带领，出版社就无法巩固，因为福利不行。同意廖才英意见，开始别搞大，把各单位搞在一起不行。出版社是企业单位，要自负盈亏。关于印刷厂，等出版社打开局面后再收。希望办个走读大专编辑班，半工半读，毕业后当专职编辑。

组织部长马志忠说，先把社长、副社长、总编辑、办公室人远





